



《玉台新咏》编纂 研究

A Study on the Editing of Yutaixinyong

胡大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玉台新咏》编纂 研究

A Study on the Editing of Yutaixinyong

胡大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台新咏》编纂研究/胡大雷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672-5

I. ①玉… II. ①胡…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018 号

责任编辑 胡文骏 李 俊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00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插页 2

印 数 1—2000

版 次 2013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672-5

定 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玉台新咏》编纂的文学生态	1
第一节 “宫体”考辨	
——兼论徐摛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1
第二节 中大通三年的太子之争与“宫体”登场	14
第三节 “宫体”在南朝各体文字的蔓延	
——“宫体之文”考述	25
第四节 唯美批评氛围中的《玉台新咏》编纂	43
第五节 徐陵与西府文学集团	54
附录 当前关于《玉台新咏》编纂者的讨论	
——徐妃为《玉台新咏》编纂者、徐陵为协助者的推测	61
第二章 《玉台新咏》的编纂思想	75
第一节 从《玉台新咏》书名看其编纂思想	75
第二节 《玉台新咏》的阅读期待与不录“风、骚”	84
第三节 《玉台新咏》与诗歌的娱悦性质	98
第四节 《玉台新咏》与出版美学	109
第五节 《玉台新咏》录诗与古代诗歌批评的阐释模式	113
第三章 《玉台新咏》诸刻本	129
第一节 赵均刻本	130
第二节 赵均刻本“整齐一番”的痕迹	134
第三节 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玉台新咏笺注》	145
第四节 纪容舒《玉台新咏考异》	148

第五节 郑玄抚刻本与徐学谟刻本	156
第六节 两大版本系统在分卷上的不同	171
第七节 “流俗本妄增诗”考辨	174
第四章 《玉台新咏》编纂体例考辨	184
第一节 从《玉台新咏》所录作品“序”看其编纂	184
第二节 《玉台新咏》删节作品考述	193
第三节 《玉台新咏》少录或多录作品考辨	198
第四节 《玉台新咏》作品作者、篇目、篇题考异	210
第五章 历代对《玉台新咏》编纂的评论	259
第一节 历代序跋论《玉台新咏》	259
第二节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玉台新咏》	270
第三节 历代对《玉台新咏》所录作者、作品的评点	283
第六章 《玉台新咏》作品风格与特点论	298
第一节 以萧纲为例考察《玉台新咏》的风格	298
第二节 《玉台新咏》所录宫体诗的抒情特点	309
第三节 关于宫体诗声律 ——以比照不同时期“齐梁调诗”为例的分析	330
第七章 《玉台新咏》系列作品研究	350
第一节 从“闺怨”到“士怨”的《燕歌行》系列	350
第二节 “增伉俪之重”的“悼亡”系列	360
第三节 “颠覆阅读”与《行路难》系列	377
第四节 从鲍照到沈约:《白紵曲》系列由“俗”入雅	389
第五节 “以赋为诗”的沈约《八咏》	398
第六节 《杂曲》系列与宫体诗写作模式新趋向	419
参考文献	429
后记	443

第一章 《玉台新咏》编纂的文学生态

第一节 “宫体”考辨

——兼论徐摛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一、“宫体”与宫体诗是有区别的

所谓“宫体”，就是宫中流行的文体。但具体是哪种文体呢？这是需要考辨的。一般大家认为“宫体”指的是诗，印象由《梁书·简文帝纪》所载而起：

（梁简文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①

明言是“有诗癖”，因“伤于轻艳”而被称为“宫体”。“宫体”指诗，似乎已成定论，所以有“宫体诗”之称。又有《隋书·经籍志四》载：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②

“篇什”之“宫体”，当为诗。又有刘肃《大唐新语·公直》载：

梁简文帝为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浸以成俗，谓之“宫体”。^③

“艳诗”之“宫体”，当然也是诗。

①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4，第109页。

② [唐]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5，第1090页。

③ [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我们再来看以下一条材料,《梁书·徐摛传》载:

(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①

人们一般认为,萧纲以“宫体”著称,此处讲太子所在的春坊“宫体”之号自徐摛而起,那“宫体”自然是诗。于是称此处的“宫体”为诗,谓徐摛是宫体诗的倡导者,谓萧纲自小与徐摛游处,在徐摛的培养下,岂有不作宫体诗之理^②。逯钦立也称:“(徐)摛文体既别,及为家令,所撰篇什,东宫尽学之,遂有宫体诗之号。”^③

其实,“宫体”与宫体诗并不见得能混为一谈。此处要论证的是,“东宫尽学之”的“宫体”者当为广义的“文”,或许其中亦含有诗,但并非单指诗。以下辨之。

二、从“徐庾体”看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

为了以下说明问题方便,此处把《梁书·徐摛传》中“‘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前后文字引得稍稍详细些,传云:

(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会晋安王(萧)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大通初,王总戎北伐,以摛兼宁蛮府长史,参赞戎政,教命军书,多自摛出。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寻带领直。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

①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0,第446—447页。

② 如曹道衡、沈玉成称:“不过作为流派来说,宫体诗的开创者是徐摛和庾肩吾。这两位诗人同为萧纲的文学侍从兼启蒙师傅,徐摛在天监八年(509)入萧纲府,正好是萧纲自己所说‘七岁而有诗癖’(《梁书·简文帝纪》)的那一年。庾肩吾入府的时间大致和徐摛同时。七岁的幼童如同一张白纸,被画上的图画当然是徐、庾的工笔重彩。”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39页。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徐摛”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19,第1891页。

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①

从这里记载的徐摛的事迹可以看出,徐摛入萧纲府后,文学成就全在“文”而不在诗;“摛文体既别”云云,是接“教命军书,多自摛出”而来的。

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今存徐摛之诗有五首,为:《胡无人行》、《咏笔诗》、《咏橘诗》、《赋得帘尘诗》、《坏桥诗》。另,萧纲有《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徐录事即徐摛,据《梁书·徐摛传》载,徐摛入萧纲后,萧纲“移镇京口,(徐摛)复随府转为安北中录事参军”;是知徐摛有《见内人作卧具》诗,但今已不见。《坏桥诗》有“何时香步归”,《赋得帘尘诗》有“恒教罗袖拂”,这是有关女色的,但并非宫体诗的典型特征。从这些诗作来看,还是继承永明体的咏物之类,并无什么“新变”与“文体既别”,其诗要引得“春坊尽学之”,恐怕不行。《玉台新咏》未录徐摛的诗作,其原因恐怕就是其诗作并非典型的宫体诗。《玉台新咏》收梁武帝诗与萧纲诗分别有数十首,亦收有徐陵诗作,这说明收某一诗人的作品对该诗人来说是抬高地位之举,而不可能有负面的影响。然而,《玉台新咏》未录徐摛的诗作,这最能说明其诗非但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且恐怕与稍后人所说的“宫体诗”不是一类型,否则没有任何理由不收。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史书言之凿凿称“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应该是指其文。对徐摛为“宫体”之文的倡导者,史书多有记述,最有力的说法就是所谓“徐庾体”。《周书·庾信传》载:

时(庾)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闥,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②

王瑶称:“徐庾体却是指‘文’的”,“向来徐庾并言,都是指他们在‘文’一方面的成就。”^③《梁书·徐摛传》即称徐摛所作为“教命军书”。《陈书·徐陵传》称:

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

①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0,第446—447页。

②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卷41,第733页。

③ 王瑶《徐庾与骅体》,《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其于后进之徒,接引无倦。世祖、高宗之世,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遂被之华夷,家藏其本。^①

文中所谓“国家有大手笔,皆陵草之”,盛赞徐陵的是其“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而《九锡》尤美”,徐陵的“其文颇变旧体”之“文”,应该是广义的即指包括诗在内的各体文章。唐人李商隐《樊南甲集序》称他自己先学“古体”,又称:

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于任、范、徐、庾之间。^②

所谓“今体”,李商隐又把它称为“四六”,这里即是称赏徐、庾的骈文。又,《周书·庾信传》载:

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③

一般来说,“一文”之“文”,广义即指包括诗在内的各体文章,狭义即指散文、骈文之“文”。王瑶称上述“一文”之“文”说:“这都是指骈文说的。”^④清倪璠《庾子山集注》注庾信《春赋》曰:

观其文气,略与梁朝诸君相似。晋安、湘东所赋,题颇类之。盖当时官体之文,徐、庾并称者也。^⑤

也指出当日“宫体”不尽是“诗”亦包括“赋”,也即广义的宫体之“文”。

三、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

《梁书·徐摛传》称“(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属文好为新变”是当时一种时尚,称说“新变”,不见得一定指“诗”的“新变”,我们看一下以下几条材料。

① [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26,第335页。

②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13页。

③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卷41,第733页。

④ 王瑶《徐庾与骈体》,《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1页。

⑤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集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4页。

《南齐书·文学·陆厥传》载：

厥少有风概，好属文，五言诗体甚新变。^①

这是专讲“五言诗”的“新变”，但其他称“新变”则不见得是专讲“五言诗”，如《南齐书·文学传论》载：

习玩为理，事久则读。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②

此前萧子显所谈、所举例都是各体文章，那么此处称“文章”的“新变”应该是广义的。又有张融临卒谈自己的文章：

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③

他所说的“变而屡奇”之“文体”，应该说是广义的，其《门律自序》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称“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④

永明以来谈“新变”，大都有音律的意味。《南齐书·刘绘传》载，张融是永明末很讲究音韵声律的“文章谈议”人士，所谓“并有言工”，“音旨缓韵”，那么，其“新变”或有音韵声律方面的因素。《梁书·文学上·庾肩吾传》云：

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⑤

诸文士“文章始用四声”应该是统指各体文章的，当然包括诗歌在内；当时人们谈起来永明“新变”多指诗歌，但也涉及赋、颂、铭、诔等各体文章，音韵声律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了广义的“文”。虽然史书对当时人们运用音律创作“文”记载较少，但人们也有谈起，后人也有谈起音律进入了“文”。如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讲文学创作运用音律，其中举的例子都是诗歌：

①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52，第897页。

②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52，第908页。

③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41，第729页。

④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41，第729页。

⑤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49，第690页。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①

但沈约也讲过前世创作散文的运用音律，《南齐书·文学·陆厥传》载其《答陆厥书》先称，假如自觉运用音律，那么作品就能普遍达到一定的水平，而不会忽高忽低，所谓“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如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阉缓失调之声？”又称前世文学创作运用音律而产生好的赋：

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②

虽然他认为前世文士并未自觉运用音律，只是“律吕自调”，但也是运用音律。

于是文学创作讲究音韵声律成为时代风尚，南朝如锺嵘所说“闻里已具”，北朝的情况亦是如此，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之《四声论》称北魏孝明帝继位之后开始兴起讲究音律之风：

才子比肩，声韵抑扬，文情婉丽，洛阳之下，吟讽成群。及徙宅邺中，辞人间出，风流弘雅，泉涌云奔，动合宫商、韵谐金石者，盖以千数……乃瓮牖绳枢之士，绮襦纨袴之童，习俗已久，渐以成性。假使对宾谈论，听讼断决，运笔吐辞，皆莫之犯。^③

这里说的情况，显然是全社会的喜好音律声韵，亦是各种文体的注重音律声韵，而不仅仅是诗。“徙宅邺中”，指东魏孝静帝立，迁都于邺，时为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萧纲是中大通三年（531）立为太子的。北朝的音律声韵如此盛行，更不要说南朝了。

再从当时及稍后时代的文人论音韵声律的情况看，除多讲诗歌外，还多涉及各体文章。如《文镜秘府论·天卷》之《四声论》也载前世文士在“文”的范围中运用音律：

① [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67，第1775页。

②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52，第900页。

③ [日]遍照金刚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81页。按，此当是隋刘善经《四声指归》的文字，详见《校注》第74页注释（1）所载任学良语。

(鍾)嶸又称:“昔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曰:官商与二仪俱生,往古诗人,不知用之,唯范晔、谢公颇识之耳。”今读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于一时,为知声之创首也。^①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称时人各体之“文”的注重音律:

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②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中记载了一些音律不谐的例子,其中既有“诗”,还有“文”。如“平头”类在叙述了五言诗的情况后,又说:

四言、七言及诸赋、颂,以第一句首字,第二句首字,不得同声,不复拘以字数次第也。如曹植《洛神赋》云“荣曜秋菊,华茂春松”是也。铭、诔之病,一同此式。^③

人们认为,这是隋刘善经《四声指归》的文字。这里“文”,即含有赋、铭、诔。又如“上尾”类称说“以第一句末不得与第二句末同声”,就指出赋、颂、铭、诔亦得遵守,并举后汉张然明《芙蓉赋》、蔡伯喈《琴颂》、孔文举《与族弟书》以及魏文帝《与吴质书》的文句为例,这也是刘善经所说。又如称说“蜂腰”类文病,引刘善经云:

刘滔亦云:“为其同分句之末也。其诸赋、颂,皆须以情斟酌避之,如阮瑀《止欲赋》云‘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即‘体’与‘粉’、‘衣’与‘除’同声是也。”^④

刘滔,当为刘绍,绍、滔形近而误。刘绍,梁人,《梁书·文学传》有传。又如称说“鹤膝”类文病,引刘善经举潘安仁《闲居赋》、温子昇《广阳王碑序》、邢邵《老人星表》、魏收《赤雀颂序》、谢朓《鄱阳王让表》、任昉《范云让吏部表》、王融《求试效启》、刘孝绰《谢散骑表》诸作品为例。《文镜秘府论·西

① [日]遍照金刚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93页。按,此当是隋刘善经《四声指归》的文字,详见《校注》第74页注释(1)所载任学良语。

②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校注《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250页。

③ [日]遍照金刚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04页。

④ [日]遍照金刚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12页。

卷》又有《文笔十病得失》，论“文笔”诸作品在音律方面的得与失，所谓“文”，即论的是诗；所谓“笔”，即论的是除“诗”之外的各体文字，所录都是前贤的言论。

四、梁武帝闻“宫体”而怒不在其为艳曲而在音律与“丽靡”

《梁书·徐摛传》称“宫体”之号兴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梁武帝萧衍“闻之怒”是为什么？此处我们以梁武帝萧衍的观念、行为证明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之“文体”，不会是宫体诗。

就文学本身来讲，萧衍是比较喜欢创作艳曲的。当时的“新变”之体宫体诗，最主要的特点是叙写艳情，即描摹女色与叙写女性生活，而萧衍是比较喜欢创作歌吟艳情的艳曲的，他好学习民歌而作当时的“新声”即吴歌、西曲歌辞。他有《子夜歌二首》：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口朱发艳歌，玉指弄娇弦。（其一）

朝日照绮钱，光风动纨罗。巧笑倩两犀，美目扬双蛾。（其二）^①

这是典型的宫体诗的风格、内容。萧衍又有《襄阳蹋铜鞮歌》，也是依民歌而作。东晋至宋齐时，文人作“委巷中歌谣”是遭正统人士抨击的，虽然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都有对女性及女性生活的吟咏，但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却是两大系统，二者并不相容。至梁武帝时，文人的吟咏女性及女性生活的诗作开始与南朝乐府民歌曲调相融合，梁武帝有开创之力。萧衍是提倡学习民歌以促文人诗歌之变的，他并非不喜好如此艳情的“新变”之“诗”。由此可见，假如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是“诗”而不是“文”，那么萧衍是不会“闻之怒”的；梁武帝萧衍的“闻之怒”，更多的应该是广义的“新变”之“文”而不是“诗”。

梁武帝闻“宫体”而怒的原因在音律。《梁书·沈约传》载，萧衍对“新变”之“诗”在音韵声律表现上的态度，沈约撰《四声谱》而高祖萧衍的态度：

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

^① [陈]徐陵《玉台新咏》，明小宛堂覆宋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43页。《乐府诗集》称为民歌。

也。”然帝竟不遵用。^①

对“新变”之“诗”，对“摘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萧衍“闻之怒”者应该是其对音律的追求与讲究。

不满意人为的音韵声律规则进入文学创作的，当时大有人在，而不仅仅是萧衍一人，如锺嵘，其《诗品序》就称：

今既不备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常谓余云：“官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论文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常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绩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间里已具。^②

而锺嵘这样讲，也有唯萧衍马首是瞻的意味，其《诗品序》曾这样称说萧衍：

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学究天人。昔在贵游，已为称首。况八紘既奄，风靡云蒸。抱玉者联肩，握珠者踵武。固已瞰汉、魏而不顾，吞晋、宋于胸中。^③

各体文字的音韵声律都引起人们关注，而不仅仅是诗。萧衍不满意四声的运用，此处的“闻之怒，召（徐）摘加让”也应该是对太子东宫中的各体文章都运用音韵声律的不满意，萧衍是看到“多自摘出”的“教命军书”都以“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为之，当然要“闻之怒”了。^④而且，《梁书·庾肩吾

①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13，第243页。

② [梁]锺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32—340页。

③ [梁]锺嵘撰、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9页。

④ 徐摘“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中有音律的因素，从其入萧纲府看，有一点巧合或辅证。徐摘是周舍推荐入萧纲府的。《梁书·徐摘传》载：“会晋安王（萧）纲出成石头，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摘，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摘为侍读。”这位周舍，《梁书》本传称其“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有很好的音韵声律基础，而其父周顒是南齐时有名的音韵声律专家，著有《四声切韵》，《南齐书·周顒传》：“（周顒）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南齐书·刘绘传》载，“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议，皆凑竟陵王西邸”，其中“张融、周顒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顒辞致绮捷”。周舍推荐徐摘时，从其全面素质考虑，也可能考虑到其音韵声律方面的才华。

传》明载,萧纲“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后,是萧纲立为太子才“转拘声韵,弥尚丽靡”的。^①

萧衍闻“宫体”而怒的原因还在于“新变”文体没有朝堂文字所应有的典雅。《梁书·萧子云传》载,大同二年,萧子云上书说,沈约所撰朝堂歌辞“不全用经典”,“弥复浅杂”;萧衍下诏:“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②因此,对梁朝当前流行的文体,萧衍是不喜欢的。《北史·文苑·温子昇传》载:

梁使张皋写子昇文笔传于江外,梁武称之为曰:“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恨我辞人,数穷百六。”^③

萧衍喜欢的是传统文风,即所谓“曹植、陆机复生”;“复生”者,现已不存在了,所以萧衍感叹“恨我辞人,数穷百六”。相对于“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就是与“今文体异”的“古体”之“文”。《梁书·裴子野传》载:

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④

《梁书·刘之遴传》载: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⑤

这类“古体”就是“典”、“不尚丽靡之词”的文字,萧衍是十分喜欢的。《梁书·裴子野传》载:

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高祖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

①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49,第690页。

②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5,第514页。

③ [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83,第2785页。

④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0,第443页。

⑤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40,第574页。

敕催令开斋速上,子野徐起操笔,味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①

周勔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称裴子野一派为守旧派,称:“守旧派中人物年事较长,他们所依附的对象,行辈也高,即高祖萧衍。”又称:“这一流派的特点是注意学古,熟悉前言往行,多识古文奇字,因此他们的贡献在史学、考古、校讎等方面,如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刘之遴校《汉书》真本,刘显识《尚书》所删逸篇等是。”^②裴子野守旧一派的文学专长在“文”而不在“诗”。既然高祖萧衍对裴子野一派的“古体”之“文”十分喜欢,那么他听到徐摛以“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来辅佐太子,当然要“闻之怒”且“召摛加让”了。由此得出结论,徐摛的“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即“好为新变,不拘旧体”之“文”,而不是指狭义的宫体之“诗”。

五、梁武帝闻“宫体”而怒的原因还在“立朋党”之虞

其实,当梁武帝萧衍听到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的情况后,“闻之怒”的最重要原因应该是政治上的,即恐怕以立文体而“立朋党”。其一,这种事情是有先例的,且这种先例是梁武帝曾亲历的。萧衍在齐时,曾经是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的成员,而萧子良组织文学集团,就有在政治上引为羽翼的意思,如子良与王融“特相友好,情分殊常”,^③王融则一心一意为了子良在齐武帝死后登基出力。从日后的情况看,萧衍是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组织的最大受益者,他通过在西邸的一段文学经历,结识并笼络了一大批文士,为他日后代齐立梁打下基础,史书对此多有记载。如,“初,(范)云与高祖遇于齐竟陵王子良邸,又尝接里闾,高祖深器之”。^④又如沈约,“高祖在西邸,与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将军,将军如故”。^⑤范云、沈约二人,在萧衍受禅建立梁朝上,出力最大。又如任昉,“始高祖与昉遇于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⑥这真是“苟富贵,勿

①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30,第443页。

② 周勔初《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5、243页。

③ [梁]萧子显《南齐书·王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卷47,第823页。

④ [唐]姚思廉《梁书·范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13,第230页。

⑤ [唐]姚思廉《梁书·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13,第233页。

⑥ [唐]姚思廉《梁书·任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卷14第253页。